

我国生育意愿下降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杨雨阳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省济南市, 250100)

摘要: 生育率逐年下降是我国当前需要正视和面对的重要人口现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中国总和生育率在 2020 年已跌至 1.3, 低于国际社会公认警戒线, 这一数据说明中国已迈入低生育率水平行列。民众生育意愿是理解与解释社会低生育率的关键因素, 而中国民众生育意愿低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包含宏观上的结构主义研究范式, 结合微观层面的家庭个体因素。笔者围绕宏观层面的制度, 经济, 文化以及微观层面的家庭个人角度, 探究我国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 指出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高昂的生育和教育成本、个人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兴起、互联网的传播技术以及代际朋辈压力等是导致我国低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生育意愿; 生育率; 结构主义;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生育率下降已成为当今世界困扰诸多国家的突出人口问题, 继西方发达国家生育率急剧下降之后, 如今我国也面临低生育率的困境。2021 年 5 月 11 日, 备受瞩目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出炉,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全国总人口超 14.1 亿, 仍是世界第一, 但人口增长率持续放缓, 体量不断缩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0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 1.3, 已经低于国际社会公认警戒线^[1]。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呈现出“总量多, 两头翘, 中间塌”的特点, 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等深层次的矛盾和挑战, 低生育率的问题无疑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人口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问题, 而日益下降的生育率造成的人口萎缩无疑将成为阻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在过去十几年内, 国家意识到了到低生育率问题并开始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为避免生育率下降导致少子化危机、老龄化危机等人口供给的失衡问题积重难返, 严重影响我国发展进程, 从 2011 年实施“双独二孩”政策, 2013 年实施“单独二孩”, 到 2015 年出台“全面二孩”政策。2021 七普数据公布后, 中国开始实行“三孩政策”^[2]。同时延长产假假期, 增加生育补贴, 力图通过各项措施, 提高生育率, 增加人口, 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3]。然而政策的调整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的人口生育率在政策修改后仍持续走低? 毋庸置疑的是, 生育率逐年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育龄青年生育意愿的降低。本文致力于结合人口社会学理论, 采取文献研究的方法, 从多个维度分析导致我国当前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 希望能够提出可参考的依据与思考维度, 为缓解当前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作出贡献。

二、文献综述

(一) 概念界定:

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代表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 由“人们的生育目的”、“生育数量的看法”、“有关子女性别的看法”三个方面构成, 宏观上, 生育意愿是生育文化的表现。微观上, 生育意愿体现个体行动者的理性选择^[4]。

(二)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系: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个体预期子女数直接决定了他们可能采

取的生育行为,同时由于个体生育行为直接决定着总体的生育水平,因此生育意愿对一个国家地区的生育水平也起着决定性作用^[5]。要探究国家生育率逐步下降的原因,必然应从生育意愿入手进行分析。

(三) 我国生育率下降的现状与特征

1、生育率与生育意愿均逐步降低

2021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出生人口规模仅为 1200 万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出生率为 8.52%,总和生育率仅为 1.3^[6]。根据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96 个,打算生育子女数为 1.75 个,说明整体生育意愿也呈现持续降低状态^[7]。

2、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2020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与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人口年增长率为 0.53%,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0.57%下降了 0.04%,这说明中国人口增长在持续减速,预示着总人口逐步向负增长迈进,将进入新的负增长时代,或许 2020 年底的人口总数将成为空前绝后的峰值^[8]。

(四) 理论解释

在理论研究中社会学的分析模式主要依据人口统计学分析,规范模型和角色理论。依据人口统计学进行研究始于 Landry 提出的社会人口转型三阶段理论,用于解释生育率由高到低的历史转变及影响因素,目前大量的人口学研究依然延续这一框架,关注社会层面的宏观中观因素^[9]。规范模型除了关注社会规范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之外,将视野转向家庭层面,研究范式更微观化。角色理论则更注重个体因素及其在家庭中的作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尤其是关于女性婚姻角色的分析,使得许多后续研究将女性作为生育意愿实证研究的主要对象^{[10][11][12]}。

(五) 国内外生育意愿研究梳理

国内生育意愿的研究,按照内容和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早期关于生育意愿测量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近期关于全国或不同地区人群生育意愿的估算预测,以及备受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国内文献来看,对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来自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其一体现在理论研究的贡献,用生育决策的成本效益分析,风险投资理论,偏好效用理论和消费储蓄理论围绕着家庭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行的研究;用生育三维模型,生育决策的多层次理论围绕社会学研究范式展开的研究。其二体现在采用人口统计学等方法展开的家庭或地区生育意愿田野调查,分析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以上研究均发现生育意愿总体出现下降趋势^[9]。

通过对过往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外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关注领域较多,学者普遍认可经济及其相关因素是影响人口生育的关键,不同的观点主要出现在政策,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但这不属于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国内学界主要从经济成本,社会保障,文化观念(受教育程度)等层面对生育意愿进行了分析,不同的文章中存在不同结果,因为选取研究对象和样本不同,存在研究结果相互矛盾的情况。国内研究成果与国外相似,都有对相关省份的具体研究,同因素在不同条件下的比较研究。但是对全国和各省份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对比研究稍显不足,可能是由于影响因素过多,变量分析的工作量和难度太大造成^[3]。除此之外,理论框架的整合相对较少,不能全面的揭示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在实证主义方面,由于时间和跟踪限制,较难深入分析生育意愿和时空演变之间的关系。

三、人口社会学视角下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中国生育率严重下跌,低于国际社会公认警戒线,人民生育意愿降低,是多种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采用宏观上的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结合微观层面的家庭个体因素进行多维度原因探析:

(一) 制度方面

作为宏观层面结构性因素的重要一环,制度层面主要包含生育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政策等。过往中国相关研究基本以生育政策为导向,计划生育政策对人民的生育意愿起到抑制作用,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全面放开三胎等政策则一定程度的提高了生育意愿,但影响力有限,在最初两年取得效果后,新出生人口和新增人口数量反而重新出现了衰退,说明政策推动生育的能力在逐步下降^[15]。即如一些学者所说,生育政策并不能成为主导人们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16]。

其次,中国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民的生育意愿。根据莱宾斯坦的生产成本—收益理论,社会保障制度会通过影响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收益进而改变生育意愿^[17]。本文在社会保障制度层面主要从生育保障与养老保障进行分析。从生育保障制度来看,中国现行生育保障体系发展并不充分,政府的缺位与责任的下沉使得企业用工成本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致使部分企业在雇佣员工时,辞退一些有生育计划的女性^[18]。此外,国家新出台的生育保障政策例如延长产假等,表面看来虽能保障女性产后获得充分恢复的时间,但在实际中由于父权制影响下的传统家庭分工和“丧偶式育儿”,会给女性继续就业带来诸多顾虑与阻碍^[19],女性仍旧面临工作与生育的根本矛盾问题。

从养老保障来看,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正在不断完善,直接冲击着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传统家庭养老地位下降,当代青年对于家庭养老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他们更倾向于关注自身的提升以保障将来的老年生活,而非依靠孩子养老,故而人们的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

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美国人口学家汤普逊提出的社会福利论对于探讨生育意愿下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社会福利的完善对生育意愿有促进作用,但当前中国生育社会福利仍存在许多欠缺之处,没有发挥去商品化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商品化^[13],加之二孩三孩放开后的婴儿潮严重冲击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医疗教育等其他福利条件供应不足,种种现状使得育龄期的青年群体对于生育望而却步。

在父权制主导的性别视角下,依据社会性别分层理论,生理基础使女性从属于家庭,且家庭内部两性分工普遍存在不平等状况,即女性由于母亲角色的特殊性承担更重的家务劳动与育儿工作。纵使参与了社会公共劳动、提高了自身的经济地位,也难以逃脱性别不平等的困局。我们可以通过性别公平理论和制度冲突理论分别进行解释。麦克唐纳提出的性别公平理论,从性别公平在不同社会领域制度设置的不相容性来解释生育率从更替水平向超低生育率的变化^[20]——即职场中的高平等性别观念使女性需要付出与男性相同、甚至超过男性的努力才能得到成就,但家庭中的低平等性别观念导致育儿、做家务等任务大多落在女性的肩上。制度冲突理论则主要关注女性的母亲角色和工作角色的冲突。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以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深入人心,女性普遍参与社会劳动让她们和社会和家庭地位都有所提升。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公私再度分离,女性不得不重新承担起家庭和社会再生产的双重责任,女性生育后将会面临求职升职难、职业生涯中断、市场劳动参与降低等问题,在这种社会现实下,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生育意愿随之被弱化^[21]。

因此国家未来应调整生育政策的重点,关注政策过度的平衡性和群体间的公平性,引导人们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政策的人性化,家庭化和与其他政策的相互配合,也应成为未来调整的重要方向^[9]。

(二) 文化层面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个人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兴起、社会平等、家庭和生育观念的转变是造成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22]。

1、女性赋权理论——女权主义和个人主义兴起

有关低生育意愿产生原因的解释理论之一是女性赋权^[13]，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独立决策能力和政治权力的增强，共同构成了女性赋权^[23]。

教育是女性赋权的重要方面，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她们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不容小觑，经济独立、思想开放的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话语权逐步提高。在家庭内拥有协商能力和决策能力，自主意识增强的中国女性在生育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女性不再甘于像旧社会那样听从安排，以“传宗接代”为己任，而是愈发倾向于采取多种方式打破传统父权社会借由生物因素对女性的压迫，生育意愿由此弱化。

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和个人的发展。随着个人主义和理性的传入发展，中国人对社会角色的认知及社会化进程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不婚不育、晚婚晚育现象日益增加。杜蒙特曾用“社会毛细管”论述人口社会学思想，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每个人都有不断向上发展的渴望和机遇，而收入所投入的消费比例有所限制^[24]。当投入生育的比例增加，用于个人成长发展的就需减少，面临着社会竞争和内卷压力的逐渐增大，青年一代愈加注重个体阶层的向上流动和自我的进步提升。生育造成的经济负担增大，个人时间挤压，生活质量降低、家庭工作冲突以及女性身体受损等问题，很大程度的抑制了青壮年一代的生育意愿。

2、低生育文化传递代际假说

自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观念深入人心，计划生育近乎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使社会形成普遍低生育意愿的文化氛围，尽管政策有所改变，年轻一代见证父母一代的低生育率，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其影响，也会降低自己的生育意愿。若要逐渐转变这种代际传递的观念，在文化和政策方面都需要更加深入的改革与更替^{[22][23]}。

3、媒体的传播与观念差异

根据社会互动的理论，生育率的下降是一个人们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过程^{[24][25]}。媒体的传播与观念差异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数字时代的全面开启，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广泛使用，将世界连为一体，人们通过网络得知同辈群体对于生育的态度并且受到其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素来重视家族的延续与扩大，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26]，如今中国互联网上有大量关于不婚不育的非主流文化，生育痛苦、养儿成本、丁克族等内容对于传统生育观念产生了强大冲击^[27]，年轻群体中还流传着“智者不入爱河，怨种重蹈覆辙，寡王一路硕博，建设美丽中国”等梗文化。更有部分极端女权借助微博等工具宣传其“不结婚不生子”的“女权思想”。互联网的非主流文化的煽动性，对民众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极大负向影响。

其次，在贝克尔消费者选择理论的视角来看，将子女看作一种耐用消费品，父母的生育决策是在收入约束条件下，权衡生育和其他消费的成本收益后决定。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消费主义盛行之下，互联网通过提供低成本的网上社交和娱乐活动部分替代了生儿育女所带来的效用满足。研究数据显示我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 26.9 小时，日均接近 4 小时，而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网民日均上网时间接近 8 小时。从“云吸猫”延伸发展的“云养娃”群体，也可得见网络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

此外互联网的使用也可能通过影响人们对于婚姻的态度和婚姻状况进行生育意愿的影响。互联网的及时性使得各类热点新闻迅速传播，例如“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上海金山砍人”“货拉拉事件”“上外投递药物”等，而大数据推算模式又会根据浏览内容和次数推送类似新闻，形成信息茧房引导形成所谓的“厌男”“厌女”“恐婚恐育”等心理。研究发现，上网时间每增加 1%，个体的生育意愿降低 1.69%，互联网的使用降低了使用者对婚姻的满意度，从而降低生育意愿。互联网视角的探究为解决低生育率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思路。政府应当加强对居民的引导，不要过度沉迷于虚拟世界的娱乐与社交，此外加强网络舆论引导，采取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加强生育政策和正确生育观念的宣传。

（三）经济层面

经济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推动着人们尤其是青年群体的生育观念由传统转向现代。影响生育意愿的经济因素可以分为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微观家庭个体收入两方面^[28]：

依斯特林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的生育率要低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29]。西方发达国家最早进入低生育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维持较高的增速，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教育医疗卫生和健康水平有所提高，逐渐接近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生育意愿的下降和生育率的降低。低生育率加剧了国家人口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缺乏充足的劳动力，经济下行压力大，加之现代社会消费主义盛行，大众的消费欲望和物质需求增加，超前消费、预支消费屡见不鲜，育龄群体可支配的储蓄收入降低，无法承担抚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形成了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

育儿成本的提高也会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成本快速上涨，使得青年人面对婚姻和生育更加谨慎。对于女性而言，城镇化和市场化虽然提高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但同时育儿成本也有所提高^[30]。我国传统观念认为，成家立业的基础是购买自己的住房而非租房，但当前房价的水涨船高导致住房负担加重，严重增加了育龄夫妇的生育成本和压力^[31]。研究通过对 20 个重点城市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贷款买房者月供占其月收入的平均比重达到 34.2%，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就占据了收入的 1/3 以上，外加衣食住行等必须生活支出，工资几乎所剩无几^[32]。教育成本过高同样不可忽视，“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是大众耳熟能详的口号，在此情况下，父母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都大幅增加。东方传统的养育思想要求父母还要承担孩子未来部分结婚与购房成本。高昂的房价、育儿、婚嫁成本与较少的经济回馈同时使得一些未婚青年对结婚生子心生退意。

家庭收入同样会影响生育意愿的变化。贝克尔认为，家庭内部影响生育的决定因素是父母对孩子量和质的选择^[4]。当家庭收入上升时，家庭花费在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上的支出也随之增加，但是对孩子质量需求的上升程度更大，因此会减少孩子的数量^[33]。

（四）家庭个体因素

长期以来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大多强调宏观方面，例如制度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未重视微观家庭个体方面的因素，但其实这些微观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1、育龄妇女年龄

关于育龄妇女年龄与生育意愿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身体状态分为年龄和健康两个部分，它是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女性的生育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生育意愿也会随之降低^{[34][35]}。此外女性年龄越高，身体状态，健康风险和遗传性疾病的发生率都有可能提高，也会对生育意愿产生一定影响。

2、孩子性别偏好

性别偏好是指对未来生育孩子的性别期待成为生育意愿的主要推动因素。如果一孩为男孩则对于生育意愿起到正向作用，反之则起到负向作用。强烈的性别偏好是影响部分人群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36][37]}。这种偏好往往在农村居民的身上更加明显^[38]，笔者进行留守儿童问卷调查时发现孩子的性别与兄弟姐妹的数量有着密切关系，例如一胎为女孩的家庭中往往会有弟弟妹妹的存在，而一胎为男孩的家庭中此种情况较为少见。

3、社会网络假说——朋辈压力也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社会行动理论和社会生态学认为个体行为受到所处社会环境的期望和预期反应的影响，社会网络成员倾向于遵守共同的信仰和实践，更容易认同和分享经验，并以此强化归属感和身份感，如果一个人的社会网络成员中都生育或都不生育，加之朋辈亲人的家人规模，生育数量，示范效应等，都会对夫妻的生育意愿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9]

4、长辈支持与照顾儿童的能力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大部分公立托幼机构解散以来,0~3 岁的儿童主要依赖非正式的照料,大部分家庭会选择祖辈的隔代协助抚养。于是照料儿童的能力与祖辈的支持态度以及能力密切相关^{[39][40]}。有研究表明祖辈是否支持生育二孩或者有无祖辈的帮忙,成为许多女性是否选择生育的重要因素^{[41][13]}。

四、总结与反思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上许多国家的共同问题。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多个维度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宏观与微观的层面来看,制度经济文化,以及家庭个体的原因,都会对生育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前国内学术界在生育意愿的研究上还存在些许多不足,未像国际研究那样形成一个多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存在部分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缺乏创新等问题^[22]。未来国内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应当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立足中国的现实实际,创立符合中国生育变化的解释性理论,为国家人口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与借鉴,推进中国人口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
- [2] 陈友华、孙永建:《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江淮论坛》2022年第2期。
- [3] 杨柠聪.全面二孩背景下人口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重庆社会科学,2020(01):94-105.
- [4]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 [5] 顾宝昌.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J].人口研究,2011,35(02):43-59.
- [6] 国家统计局,2020年
- [7] 林宝.从七普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趋势[J].人民论坛,2021(15):56-59.
- [8] 乔晓春.从“七普”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变化和现状[J].人口与发展,2021,27(04):74-88.
- [9] 张原,陈建奇.变迁中的生育意愿及其政策启示——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决定因素实证研究(1991—2011)[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5(03):79-91.
- [10] 陈卫,史梅.中国妇女生育率影响因素再研究——伊斯特林模型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2(02):49-53.
- [11] 郑真真.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4(05):75-80+82.
- [12] 周兴,王芳.中国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与生育决策[J].人口学刊,2010(04):18-22.
- [13] 何姗姗.超大城市“新任妈妈”的再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社会建设,2021,8(06):25-39.
- [14] 张原,陈建奇.变迁中的生育意愿及其政策启示——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决定因素实证研究(1991—2011)[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5(03):79-91.
- [15] 谭雪萍.成本-效用视角下的单独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徐州市单独家庭的调查[J].南方人口,2015,30(02):1-12+22.
- [16] 徐巧玲.收入不确定与生育意愿——基于阶层流动的调节效应[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40(05):61-73.
- [17] LEIBINSTEIN H. Beyond economic 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8] 冯帅帅,梁小燕:《职场性别歧视研究:一个性别用工成本差异的视角》,《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 [19] 邱婷:《婚姻市场转型与农民家庭的婚姻策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 [20] Peter McDonald. GENDER EQUITY,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UTURE OF FERTILITY[J].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0, 17(1).
- [21] 计迎春,郑真真:《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 [22] 吴帆.生育意愿研究:理论与实证[J].社会学研究,2020,35(04):218240+246.
- [23] 胡荣、林彬彬:《性别平等观念与女性生育意愿》,《求索》,2020(4)。
- [24] A. Dumont, Depopulation et Civilisation, Etude Demographique, Paris, Lecrosnier et Babe Libraires editeurs, 1890.
- [25] Ansley Johnson Coale, Susan Cotts Watkins.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01-01.
- [26] 王天宇,彭晓博.社会保障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5,50(02):103-117.

- [27] 邱磊菊,冯宜强,史宇鹏,孙宝文.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J].人口研究,2022,46(03):3-15.
- [28] 张孝栋:《中国低生育率研究进展:一个文献综述》,《人口与发展》2021 年第 6 期。
- [29] R.Easterlin,Population,Labor Force,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Research,1968.
- [30] 熊永莲,谢建国:《贸易开放、女性劳动收入与中国的生育率》,《财经科学》2016 年第 4 期
- [31] 张樨樨:《房价泡沫抑制了生育率复苏吗?——论生育率与房价的动态因果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
- [32] 李勇刚,李祥,高波.房价上涨对居民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410
- [33] BECKER G, LEWIS G.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1973(81).
- [34] 卿石松、丁金宏:《生育意愿中的独生属性与夫妻差异--基于上海市夫妻匹配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5(5) .
- [35] 李翔、赵昕东:《全面二孩政策效果是否显著?--基于福建地区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东南学术》,2019(4) .
- [36] 郑真真:《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5) .
- [37] 陈卫、靳永爱:《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人口学刊》,2011(2) .
- [38] 风笑天:《影响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探索与争鸣》,2018(10) .
- [39] 陈秀红:《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17(1) .
- [40] 刘婷婷:《阻力与助力:工作-家庭冲突对城市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河北学刊》,2018(6).
- [41] 田艳芳、卢诗语、张革:《儿童照料与二孩生育意愿--来自上海的证据》,《人口学刊》,2020(3) .

Demographic sociology analysis on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tention in China

Yang Yuyang

(Author address, City / Province, Postal Code)

Abstract: The annual decline of fertility rate is an important population phenomenon that China needs to face up to. China's total fertility rate dropped to 1.3 in 2020, below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warning line,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indicating that China has entered the low fertility level. The general low fertility desire is the key factor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the low fertility rate of society, and the low fertility desire of Chinese people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Specifically, it includes the structuralism research paradigm at the macro level and the individual family factors at the

micro level. The author around the macro system, economy, culture and micro-level family personal point of view, to explore the reason for decline in fertility intentions in our country, points out that the imperfec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igh fertility and education costs, individualism and the rise of feminism, the spread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intergenerational peer pressure is a major cause of lead to China's low fertility intentions.

Keywords:fertility intention ; The fertility rate ; Structuralism ; Factors affecting

作者简介（可选）：无